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7.11.030

# 苏童《黄雀记》中的宿命悲剧文化探究

于惠红,刘昕华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黄雀记》作为苏童最新的长篇力作,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高度体现了他的宿命论思想。通过对种种偶然与巧合事件的描述和对意象的多重隐喻诉说人物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不良的家庭环境和危险的三角关系是导致人物宿命悲剧的重要因素。悲剧的宿命意识笼罩整部作品,体现了作者对人文的关怀。

**关键词:**《黄雀记》;宿命悲剧;意象;家庭;三角关系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11-0123-04

苏童作为先锋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以其多变的风格、诗意的叙述在当代文坛散发独特的魅力。苏童的大部分小说习惯沿用“香椿树街”为地点,《黄雀记》也不例外,但小说也体现了苏童先生在题材、风格以及结构上力求新变的努力。就当前而言,学术界对于《黄雀记》的研究,主要从人物命运的纠葛、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在转型时期的写作的新变等方面进行。对《黄雀记》的研究体现出一定创新的有岳雯的《既远且近的距离——以苏童〈黄雀记〉为中心》。论文从叙事空间的层次出发,以香椿树街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人物情节和主题,着重于对香椿树街这一叙事空间文化意蕴的揭示和人文的关怀。

本篇论文主要着重于《黄雀记》中宿命悲剧的研究,虽然关于《黄雀记》中的宿命论、悲剧命运等的研究已有许多前辈对此进行了论述,但希望通过认真的阅读作品,从而写出自己的想法。论文从作品中的偶然事件以及意象的多重隐喻入手再现人物悲剧命运的宿命性,进而分析导致这无法逃避的宿命悲剧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原生家庭所导致的性格缺陷和3个主人公的三角关系所带来的爱恨纠葛。

## 1 再现人物悲剧命运的宿命性

《黄雀记》以香椿树街为背景,以中心视角切换的方式,讲述了3个年轻人因为青春期荷尔蒙的萌动而发生的强奸案的故事,这背后体现了苏童对于宿命悲剧的思考。宿命是一种看不见也无法理解的神秘而又坚定的力量,人的一生遭遇过的偶然与曾经以为的必然,都可以归类为这个人一生的命运。小说《黄雀记》通过对种种偶然与巧合事件的描述和对意象的多重隐喻诉说人物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性。

纵观《黄雀记》这部小说,偶然与巧合的悲剧色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照相馆的一次失误,精神病院的初次相识,到小拉收音机的利益纠葛,再到水塔的矛盾爆发,虽然真正的命运轨迹还未事先做出定论,3个主人公的命运走向仿佛在作者所营造的细节中已经得到预示。小说中保润暗恋的照片上的女子是一副愤怒冰冷的样子,这仿佛就在预示着这是一段得不到美好结果的爱情。对保润捆绑技术以及保润捆绑时心理活动的详细描写,无形之中为后文与柳生的相遇做了铺垫,而就是这个能让保润值得骄傲能给他带来自信的一项技能,把他推向了人生的万丈深渊。一切的偶然与巧合并不是简单的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它仿佛是命运给予人的一个选择,但令人感到荒谬的是,面临这样的选择,人往往并不能轻易地摆脱命运的不幸。也许正是这样命运才变得异常的神秘莫测,宿命论才会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

收稿日期:20171023

作者简介:于惠红(1995-),女,湖南武冈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蒂固。中国古代就有许多关于宿命的解说和阐述,正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人们的生活生产更多的受自然力量的控制,所以古人把自身的命运归咎于天地神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人类渐渐地摆脱了自然力量的束缚,对于命运的言说也越来越具有理论的色彩,如《物种起源》、尼采的超人主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等,但命运仍以其复杂性与不可控性让人感到神秘和敬畏。作品《黄雀记》中种种偶然与巧合的事件不仅连贯了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还预示了整个故事悲剧结局。虽然无论是含冤入狱的保润,努力赎罪的柳生,还是永远逃离的仙女,他们都在挣扎着逃脱各自悲剧的命运,但他们依旧无法摆脱先验存在所安排的一切,最后还是落得再次入狱、失去生命、再次逃离的下场。

使得《黄雀记》这部作品充满宿命悲剧色彩的不仅仅是人物命运相互交织的偶然与巧合,还有浓墨重彩的意象的多重隐喻。就拿最使人注目的频繁出现在香椿树街的“绳索”的意象来说,对于祖父来说“绳索”的捆绑象征着生存的迷惘以及传统道德文化在当下的格格不入。对于保润来说“绳索”的捆绑象征欲望和尊严,保润的绳子捆住了精神病的祖父,捆住了柳生、仙女和自己的命运。对于爆发户郑老板来说绳子是郑老板慌乱不安、极度压抑的内心的外向表达,象征着精神的压抑和时代的逼仄。捆绑的绳索,一方面束缚着人们追寻历史深处的根,一方面体现了对年轻一代青春和成长的关注,一方面直指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们精神的压抑与逼仄。苏童先生自己曾说:“打结是关于捆绑和束缚的隐喻,隐喻漫长的政治社会,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乡村居民,整个民族都是被绳子捆住手脚的。”<sup>[1]</sup>因此“绳索”的意义不仅仅是捆绑祖父捆绑仙女,更是对整个社会和国民命运捆绑与束缚的深层隐喻。当然小说中的意象不仅仅只有“绳索”,还有“失魂”“水塔”“白兔”“河流”等等,它们都对人物命运轨迹起着预示性的作用,充满了宿命性。苏童通过对悲剧意象世界的苦心经营,用诗意朦胧的意象,叙述个体和社会、虚构与写实、传统与当下之间的联系,以及真挚真实的感受,使得小说在隐喻悲剧意味的同时诉说了对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但又不乏诗意圆融的气息。

## 2 导致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

尽管宿命不可违,命运控制人生是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但命运这个定数也涵盖诸多因素,在小说《黄雀记》中导致3个年轻人悲剧命运与悲剧人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导致的自身性格扭曲和纠缠不清的三角关系造成的复杂情感矛盾。

家庭是人成长的港湾,家庭环境对人的性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关系的和谐程度以及家庭成员的性格修养、行为习惯、思想观念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对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性格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性格决定命运”<sup>[2]</sup>,《黄雀记》中3个主人公悲剧的性格是悲剧命运的开始,而作品中所呈现的3种不良的家庭环境则揭示了其悲剧性格的根源。

保润的家庭充满抱怨和冷漠:母亲缺乏孝心,对祖父充满抱怨和嫌弃。父亲懦弱无能,眼睁睁看着年迈的父亲备受欺负,却不敢反抗妻子的命令。因为家庭的争吵和祖父房间的征用出租,儿子与父母之间缺乏沟通,误解重重。又因为祖父的病,保润的青春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使保润对于人情与世故是疏离的,在与人交往之中显得木讷和稚拙。他喜欢仙女但是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反对母亲为了赚钱把年迈的祖父丢弃在精神病院却不知道反抗。苏童曾谈到:“我每写到一大群孩子,当中都会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出现,像一个游荡四方的幽灵,他们与其他人的那种隔阂感不仅仅是与成人世界的隔膜,它还存在于同龄的孩子之间,他们与整个街区的生活都有隔膜。”<sup>[3]</sup>保润显然就是这部作品中孤独的孩子,与同龄的伙伴、家中的亲人的关系是有隔阂的,与整个香椿树街居民的生活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柳生出生在香椿树街的屠户家庭,父母两人各占街头街尾,垄断了香椿树街的猪肉生意。“新鲜的猪肉与热气腾腾的猪下水衍生了权力,也罗织了人情,这户人家在街上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sup>[4]</sup>显然柳生生活在一个优越而又市侩的家庭,优越的生活条件使柳生时髦帅气,猪肉衍生的权力使柳生在人

际关系中游刃有余。相比保润的土气与木讷,柳生显示出了较早见识社会的油滑与机警。假如没有水塔中犯下的错误,柳生的人生应该是顺利且成功的。青春期性意识的萌动,原本属于正常现象,但缺乏学校和家庭的正确引导使柳生犯下强奸的大错。而犯错之后,柳生的父母非但不劝自己的孩子投案自首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利用金钱和权力帮助柳生嫁祸他人。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这样溺爱孩子的父母手中,柳生一错再错,虽然逃过了10年的牢狱之灾,但从此背上了无比承重的精神枷锁:“你的快乐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你的自由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你的全部幸福都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你必须夹着尾巴做人。”<sup>[4]</sup>“这种负罪感抑制了青春期特有的快乐,使他变得谦卑而世故。”<sup>[4]</sup>

相比保润的不和睦的家庭、柳生优越市侩的家庭,仙女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更加问题重重。她被亲生父母抛弃,被老花匠夫妇收养,由于经济窘迫,精神病人是玩伴,红色药片是糖果。在一次与精神病人的游戏中受到了伤害,使得仙女对这个世界充满不信任与愤怒,这不信任与愤怒在别人看来来路不明,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她的家庭环境与成长经历所造成的。老人的养育给予的是不完满的爱,受不到好的保护,没有好的经济条件,所以她不信任所以她愤怒。童年时期精神和物质的匮乏,让仙女更加追逐逐金钱和外表这样世俗的东西。强奸案的发生,仙女本来是最大的受害者,但在柳生母亲邵兰英的贿赂下,她违背良心指证无辜的保润,使自己从受害的人变成了案件的帮凶,也因此备受伤害中逃离了香椿树街,被迫早早地走向物欲横流的社会。她在歌厅做歌女,给郑老板当秘书,做庞先生的二奶,游走于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童年失去家庭的庇护,又因为强奸案有着不光彩的历史,仙女的悲剧和沦落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个体生活于这个世界,主要有五大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sup>[5]</sup>家庭是这些需要最初的提供者,家庭对孩子需要的给予影响孩子的一生。而保润、柳生和仙女三人的家庭对于这些需要都存在各方面的缺失,这样的缺失也导致了三人悲剧性格的形成:保润的孤僻不合群、柳生的自我控制的缺失和世故、仙女的乖张无礼势利。这些性格也决定了三人的命运,伴随他们一生的不仅仅是强奸案的悲剧,还有更多的悲剧。

如果说家庭环境与成长经历导致小说中3个主人公各自性格的悲剧,那么3个受侮辱受损害的当事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和复杂的三角关系则直接造成了他们各自成长和人生的悲剧。

保润喜欢仙女,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刁蛮任性的仙女无论多么地脾气差没有教养,在保润的眼中都是散发着诗意的。这陌生而强烈的感觉,让保润的心里充满着仙女的身影。保润曾尝试给仙女写情书,可是由于表达能力有限,他满腔的爱意从“亲爱的仙女同志”<sup>[4]</sup>开始,却至今都没有续写下去。保润并不懂得该如何表达爱意,而任性刁蛮的仙女也是不会青睐于这样的保润的。仙女欠钱不还,还言语侮辱,忍耐到极点的保润用捆绑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与愤怒。虽然和柳生对待仙女的方式大大不同,但正是保润的捆绑才诱发柳生对仙女的强暴之心。爱情中的一厢情愿有时候并不能带来好的结果,带来的有可能是无尽的苦难与折磨。十多年后,保润的不幸同样是由仙女引起:为仙女被柳生抛弃而不公和愤怒,因此对柳生产生了杀机。从一场冤案走向一场真正的凶杀案,保润既没能从仙女那里找回失去的尊严,也没能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最后成了真正的犯罪分子。命运是如此可笑和荒谬,但也许保润的命运就是这样,为了仙女也为了自己的尊严,这是他不得不做的事。

保润与柳生在井亭医院初识,保润因为性格的原因需要柳生的帮助来接近仙女,而柳生也需要保润为自己省下照顾精神病姐姐的这个大麻烦,两个少年之间产生了莫名的默契和美好的友情。保润与仙女的感情并没有在相处之中日渐升温,而是愈演愈烈,但柳生却在撮合保润和仙女的时候对仙女产生了异样的情愫,因此水塔中的强奸事件就这样看似荒谬却又合乎情理地发生了。水塔事件之后,保润遭到柳生的欺骗与背叛,遭到仙女的不实的指证,从而含冤入狱。保润在狱中生活艰苦,又传来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抛弃他改嫁的消息。悲惨绝望的境遇让保润时刻记住柳生带来的仇恨,最后在柳生新婚之夜发泄了所有的仇恨,却使自己堕入真正的罪恶的深渊。与此同时柳生在犯错和背叛保润之后,一直生活在保润的阴影之中:“与祖父相处,其实是与保润的阴影相处,这样的偿还方式令人疲惫,但多少让他感到

一丝心安,时间久了,他习惯了与保润的阴影生活,那阴影或浓或淡,俨然成了他生活不可缺少的色彩。”<sup>[4]</sup>但柳生的偿还除了心理安慰,并没有起到让保润原谅自己的作用,最后还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而柳生与仙女的关系则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微妙。柳生也是爱仙女的,是白小姐以前的仙女,是来自少年时期所萌发的青涩的爱意。曾经的强奸案经过了时光的打磨,呈现的是美好而诗意的画面。对青春的怀缅总是充满着朦胧的诗意,这诗意的记忆背后也深藏着年轻时的柳生对仙女的那份复杂的情感。但这情感既脆弱又渺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而仙女对柳生也并不像保润那样没有感情只有讨厌。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她忽而走神,回想起这个男人十年前的样子,英俊、浮夸、轻挑、微卷的头发上抹了过多的钻石牌发蜡;他是她的舞伴、小拉;他们一起跳舞、小拉;咚、嗒、嗒咚,她记得小拉的舞步;她记得钻石牌发蜡的香味;她记得自己当初对柳生紊乱的情感,有时讨厌,有时是喜欢的,如果当初他们是在水塔里跳小拉,如果当初他懂得爱抚女孩的方法,如果当初她爱他多一点,如果水塔之约推迟了3年,他们之间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呢?”<sup>[4]</sup>可是世间没有如果,命运就是这样荒谬,让还在萌芽的爱未开放就变成刻骨的恨。多年之后仙女困顿地再次回到香椿树街,在受到柳生义无反顾的照顾与爱护之时,她又想起了这份感情,打算原谅柳生,托付终身。但柳生终究还是无法逃脱世俗的眼光,拒绝了仙女,娶了别的女人,最后招来杀身之祸。而仙女也在众人的谴责与内心的极度绝望之时诞下女婴再次逃离。爱情和青春的浪漫、放纵、潇洒,终究不过是被风吹雨打去,都逃不过悲剧的命运。

仙女和柳生使保润陷入爱情的地狱;柳生与保润使仙女颠沛流离,尝尽生活的苦难;柳生在嫁祸保润之后陷入生活的压抑和精神的惶恐之中。他们的人生经历验证了这样一句话:“无法抗拒他人对我的自由的限制,无法摆脱他人对我本质化的威胁,导致我的存在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中。”<sup>[6]</sup>他人的存在就是对自己的威胁,即“他人就是地狱”。纠缠不清的三角关系催生的一系列的矛盾和磨难使3个年轻人的一生都囿于无法摆脱的悲剧之中。

小说中塑造的3个主人公因为一时冲动而开始了彼此偿还和纠缠的一生,他们试图原谅、试图逃离、试图忘记过去。但仿佛冥冥之中都有定数,柳生以死还债,仙女再次逃离,保润又回到监狱,兜兜转转一切又回到原点。他们经历了懵懂残酷的青春,被迫仓促走向社会,又在社会的影响下历经生活的苦难和折磨,最终走向各自的毁灭。悲剧的宿命意识笼罩着整个作品,《黄雀记》的命名也由此而来,作品中所阐述的宿命悲剧的观念,来自于中国古代一句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蝉和黄雀形象地表达了“前者的危险来源于后者,象征着外部力量对自身的影响;其次说明了前者的危险又都是来自于后者,预示着某种命运的循环。”<sup>[5]</sup>苏童这种强调外部环境决定命运的意识似乎和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宿命观不谋而合。在物欲横流、经济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变得越来越势利和缺乏爱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存在着隔阂。作者这种宿命的悲剧观念,虽然存在一定的夸张、戏剧的成分,但艺术取材于生活,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苏童对于现代社会存在的弊病和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层思考与关注。

#### 参考文献:

- [1] 周名瑞,周春英. 苏童的“绳索”——《黄雀记》赏析[J]. 名作欣赏,2015(5):74-75.
- [2] 杨晓慧. 性格决定命运——浅析苔丝悲惨命运的根源[J]. 科教文汇,2014(5):54.
- [3] 苏童,王宏图. 南方的诗学·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
- [4] 苏童. 黄雀记[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 [5] 刘丹. 论苏童小说《黄雀记》的宿命意识[J]. 名作欣赏,2016(12):12-14.
- [6] 李克. 存在与自由——萨特文学研究[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责任校对 龙四清)